

正确认识新时代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大原则

邓育苗^{1,2}

(1.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2. 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金融高水平开放是中国特色开放型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关键环节,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全方位、多层次提高金融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以金融资源要素的流动与合作搭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和桥梁;遵从经济规律,以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加强风险意识,健全系统化、贯通性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高效运行与质量提升。只有明晰、落实新时代金融开放的重大原则,才能在保障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进全球经济共荣共享。

[关键词]金融开放;新发展格局;实体经济;金融监管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3.03.001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3)03-0001-07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需要更好的中国。面对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纷繁复杂的局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1]32},在此战略推动下,中国的金融开放也必然不断纵深发展。其实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提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且要在开放有序的条件下“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2]281}金融开放作为助力金融更好发挥功能的有效手段,目的是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质是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遵循开放的重大举措“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原则,我国的金融开放自2018年以来一直稳步推进。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对金融业开放的领域作出细化,“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的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从“稳步”精进为“稳慎”。^[3]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由此可见,对金融开放的要求蕴含着深化内外两个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内在要求,同时在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下对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问题该何去何从成为当前复杂环境下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议题,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与金融开放的重要论述,是正确理解新时代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重大原则的理论指南。

一、坚持战略导向,以金融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创造性提出的重大战略。新发展格局的决策,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过去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依赖国际循环的局面,走向以国内循环占主导地位、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反而是一种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积极主动的开放。尽管目前遭遇了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回答了如何顺应世界动荡局势下我国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敏锐把握,推进中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的前瞻性布局。

金融开放是未来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投稿日期]2023-07-06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编号:23LLMLC0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1YJC630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203249)

[作者简介]邓育苗(1985-),女,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

的战略重点与关键环节,理应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放”是内外联动,重点在于互利合作,解决由低水平转向高水平开放的问题;“循环”是动态过程,关键在于畅通无阻,解决内外资源要素自由顺畅流动的问题。金融通过“开放”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实现更大范围的“循环”主要涵盖三个要点。其一是金融业的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1]32},这也是“十四五”期间的主攻方向。外资金融机构带来先进的市场规则和管理理念、成熟的服务模式和业务能力,可能会使国内市场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成为倒逼国内机构金融改革的重要推动力,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进金融以更高水平开放,并合理运用“鲶鱼效应”丰富境内市场主体、优化引资结构,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其二是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金融开放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这表征以外部资源作为内循环的重要支撑“引进来”的同时也能够向外循环延伸,提高“走出去”的水平。根据金融开放的战略步骤和实践路径,不仅要对外币汇率实行市场化改革、对资本项目进行有序开放,也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提高金融业国际化水平。^{[4]303}其三是有效防止“硬脱钩”。实施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链接内外,是防止“硬脱钩”的基础保障。当前,中美博弈进一步加深,加上国际形势不稳定,使得全球产业链、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面临“脱钩”风险。但越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我国越要在战略高度上将金融开放置于新发展格局战略决策中予以考量和谋划。

金融开放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金融领域的落实途径,以提高自身开放型优势有力支撑国内大循环,以金融资源要素流动与合作搭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由此,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建构具体应把握以下重要领域。

(一) 金融资本领域: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敞开国门吸引外资一个重要目的是能够通过开放促进自身建设。^[5]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态势变幻莫测,美联储激进加息,我国如何高质量利用外资稳定增长的形势更趋复杂,具体来说应该关注以下三点。一是要让资本进得来。其关键在于打通进入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如前所述,着力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21年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中国金融业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和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的态度,表征着我国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向更高水平金融

开放迈进一大步,它的实施有利于为内循环提供资本增量。二是要让资本留得住。过去我们的政策过度依赖短期性措施,这些政策在一定时间内肯定会利好外资投资,但其效果难以持久,甚至长远看会带来负面影响。现阶段我们应侧重于吸引长期投资,在今后的扩大吸收外资政策措施中,以我国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为坚实后盾,重点关注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其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水平,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信心,增加外资长效稳定的投入。三是要让资本有效投资。在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强调对待资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6]。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规制资本扩张并不是说不要资本,而是要让资本从“无序”扩张到“有序”发展,因此,对于金融开放环境下引入外资进行有效投资的思路,其着力点在于引导资本进入国家亟需发展及亟需补短板的领域,既充分利用外资在国内有序流动和有效投资,又牢牢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服务于内循环。就国家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尽管目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2023年1-4月我国吸收外资499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①,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对境外长期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 国际货币领域:审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实体经济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石,我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保障。从现实情况看,人民币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的A股、债券等被纳入MSCI、富时罗素、彭博巴克莱等多个国际知名指数中,“沪港通”“沪伦通”“深港通”“债券通”等平台的建设也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到“审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表征我国仍需深化金融改革与开放,提高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相匹配的能力,创造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条件。美国将俄罗斯踢出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对我国是一个重大警示,不排除美国同样通过SWIFT威胁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在此国际环境下,未来应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加快人民币走向世界货币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体系构建。其一,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完善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是习近平提

①数据来自国家商务部公布。

出金融对外开放的着力点之一,区域冲突的爆发可能会使“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影响,但并未动摇我国建设“一带一路”重大决策的决心。进一步通过“一带一路”重大项目与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空间上扩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的使用场域,推动实现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的本币兑换和结算,同时也鼓励境外人民币投资回流,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其二,培育人民币大宗商品贸易计价结算功能。2018 年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原油期货在上海正式上市,这是第一个境外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的期货商品,是我国扩大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其三,积极探索数字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加快国内城市试点运行数字人民币,同时精简跨境支付的繁杂程序,发挥其即时跨境支付的优势,成为抵制美元霸权的有效手段,摆脱美国主导的 SWIFT 系统的制约。

(三)自贸区领域: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率先探索、充分试验”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7]54}。依托自贸区建设制度创新这个核心任务,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改革创新政策都能够通过多维度、分试点的方式在自贸区先行先试,不断摸索与实践,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其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利用优质金融企业集聚效应增加金融供给;进一步推动金融国际化,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自贸区和自贸港先行先试;支持实体企业融资需求的改革创新举措;同时探索投融资及汇兑方面的便利措施,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其二,拓展跨境金融服务的功能。目前我国移动支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下一步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图提高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创新人民币跨境流动方式,增强竞争力。其三,发挥差异化改革创新的优势。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定位上海自贸区是向全世界亮明我国全方位开放的标杆,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上海在分账管理、外汇管理等基础性制度创新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和推广的金融模式,广东前海和南沙也是金融开放的排头兵,形成股权投资培育新兴产业及“科技+跨境金

融”等创新实践成果。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大举措,力求探索出更多能够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金融开放制度创新的有效手段,对我国未来提升国际大循环的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遵从经济规律,以金融开放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的天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开放作为助力金融更好发挥功能的有效手段,更应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现阶段,金融领域的开放面临加剧“脱实向虚”偏向的可能性。金融开放一方面活跃了跨境资本自由流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开放了的金融市场同样也刺激了跨境资本流动的投机和套利本性,让“炒”成为国内外投资者按捺不住的强烈冲动,致使开放下的金融更有放大与实体经济脱离运行的迹象。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一时兴起的“跨境炒房”使国内高净值人群蜂拥进行所谓的“海外置业”^①;与此同时,开放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有流出必然会有涌入。国外“热钱”通过多种渠道进军我国楼市,会导致房价攀升并吹大房价泡沫,而一旦跨境资本实现其无风险套利收益后有可能就会迅速撤资,这将引发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金融一旦开放,不仅会加重这种偏向,还会使风险扩大化和传导性更强,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潜在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早在 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金融回归本源”的重大论断^{[2]278},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实体经济,实现实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是当前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7]115-116} 另一方面,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习近平多次强调,金融的天职、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7]116}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对拓展金融服

^①根据网络公开数据整理。自 2018 年中国金融业开启新篇章以来,仅第一年海外置业咨询量增长率就为 52.9%;但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底以来中国买家对海外住宅房地产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下降约 50%。

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厘清了思路,这同样也是金融开放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金融开放来讲,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其重要特征就是要服务、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才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坚实后盾,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这一基本方向,无疑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造成重大风险和损害。

金融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一带一路”金融创新等多方面举措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金融开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思路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7]117}的重要规划指引,对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具体路径在于更宽领域利用外资,疏通金融支持渠道;更高效率配置资源,营造良好金融环境;更大力度助推产业转型升级,金融扶持科技创新。

(一)多角度拓宽跨境资本进出渠道

资金融通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重要的功能,通过金融开放破除限制金融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充分吸收跨境资本流入国内市场,增加资金供给。从机构准入维度入手,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及缩减负面清单,放宽外资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限制,同时在股东资质、设立形式、业务范围及牌照数量等方面降低要求和标准,扩大吸收外资规模,到2021年我国已全面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从市场开放维度入手,主动发展国内外资本市场联动,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2019年9月我国全面取消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等的限制,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和RQFII直接入市。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的开放是双向的,资金充分涌入的同时必然也存在输出。对此,我国在拓宽资金内外流动均衡的渠道上,增加境内机构境外发债规模并允许募集资金回流境内。先后出台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人民币合格境内投资者RQDII渠道,加上“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北向互换通”的启动,进一步便利了跨境资本流动。可以看到,这些年我国金融开放水平虽然在持续提高,但资本项目仍然是部分管制状态。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放开,有助于稳定

市场预期,达到增强境外投资者信心、更多吸收外资的目的。进一步说,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助于帮助实体经济释放风险,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金融双向开放必须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协调统筹。对于拓宽金融开放渠道有可能产生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明确指出要做好金融平稳开放的动态管理和风险防控,在开放顺序、重点领域上合理安排并加快推进,在风险上要建设防范风险的有效机制。^{[2]281}

(二)多元化建设金融业开放支撑体系

当前我国金融与经济发展存在时间和空间结构上的错位,习近平总书记敏锐觉察到了这种“匹配失衡”问题,指出“金融业的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8]。要妥善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定调需要扩大开放,同时明确需要“优化金融体系和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体系的质量和服务效率”^{[7]117},具体而言,一方面,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平衡金融市场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获取融资的方式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拓宽金融领域的开放尤其是作为直接融资代表的证券业的开放,既吸引资本要素在国内流动,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又推进中国金融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为国内及跨国企业筹集资金,这对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针对不同特点的企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金融机构“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9]308}。而对于金融创新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鼓励积极探索经济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质增效;与此同时,加强内外金融市场协同,满足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内外金融机构深度合作有助于减少不同金融市场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畅通整个金融市场服务的协调性,满足实体经济在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同需求。

(三)多方位引导金融开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要以推动产业发展和升级为主要任务,并在产业的融资、投资和增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经济长期保持“无危机增长”稳定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能够吸引创新面和技术面强大的外资机构投资,这对于补齐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是有利因素。其一,高质量引入外资机构设立研发中心,其示范效应能带动我国企业提高生产

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其重大技术溢出与扩散效应能快速提升我国短板产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创新。与此同时,为吸引外商外资,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环境,也要注重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要在审查质量和效率上下功夫^[5]。其二,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在证券市场方面,开设科创板,引进外商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加快创新成果、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保险业方面,利用来源稳定、期限长的保险资金设立投资基金,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要做好核心技术的保护,健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体系。其三,注重并购活动对实体经济存量资源再配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并购业务使存量资源能够被更高效、更充分利用,统筹内外拓宽了产能兼并重组和改造升级的国际视野,助推我国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化发展,提升我国境外资产的收益率并支持收益回流国内,提高国内企业的收入与产出能力。

三、加强风险意识,金融开放更需强化金融监管

金融开放存在放大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潜在风险。从国际经验看,实证研究表明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金融开放(包括资本账户开放)后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金融危机,例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拉美、亚洲国家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些例证为中国开放道路上的方向和决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并没有对本土金融行业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历史时刻警醒着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尤其是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与世界经济金融越来越深度的融合也将使中国面临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加剧。尤其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策源地爆发的金融危机溢出效应显著,使风险全球交叉传播的几率不断上升,加之当前国际经贸摩擦日趋频繁,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给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研判当前中国金融风险形势总体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也深刻揭示出国际金融风险外溢有对我国金融发展造成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一是有可能使金融风险从经济领域上升至政治和社会领域,提出“要注意防范风险叠加造成亚太经济金融大动荡,以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金融风险演化为政治社会问题”^[10]。二是一旦发生危机,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最先受到冲击,“如果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急刹车’或‘急转弯’,将产生

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11]。面对国际上将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认为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才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才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9]153}。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做好金融工作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

金融开放条件下应对系统性风险要避免两个认知误区,其一是误判金融风险小,在对外开放中盲目放松金融监管;其二是缺少“四个自信”,认为开放会招致金融危机而监管过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监管能力必须跟上,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要结合我国实际,学习和借鉴国际上成熟的金融监管做法,补齐制度短板,完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方式,确保监管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5]。也就是说,金融监管是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前提,金融开放受到金融监管的制约,金融监管能力的高低决定金融开放的程度,监管水平越高,开放的潜力越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就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能力得到加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在增强。^{[2]278}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金融合作只会越来越紧密。因此,强化金融监管的思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首先定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这是能够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制度优势和根本保障。“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2]281}在党管金融的基调下,金融的对外开放应立足中国国情实现“内防滋生、外防输入”,深刻把握风险防控这一金融监管主线,为开放条件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筑牢“防火墙”。

(一)主动塑造系统性金融监管理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外金融环境面临严峻变化,需要不断探索符合新形势的监管理念,提升监管效能。一是坚持底线思维。金融开放并不必然导致金融风险,但金融行业本身的属性就是与风险相伴共生的,这种固有特征在金融对外开放中有被放大的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就是要“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2]288},牢牢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

是说,金融的开放始终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首位。居安思危,提高前瞻意识,宁可把金融开放进程中面临的形势、挑战和局面考虑得严峻一些,做最坏的打算去争取最大的期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保持治理定力。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局势,尤其是近期一些区域冲突的爆发,监管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必须“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不要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更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各种陷阱”^{[12]285},立足金融监管的定力,提高金融开放监管的专业和效率,精准防控,坚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强监管、严监管路线,坚持有底线的开放。三是提高治理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领导干部能有准确把握金融发展规律的意识、清晰研判金融严峻形势的水平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因此,当前扩大金融开放条件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关涉金融工作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强烈的监管意识,才能够在工作中把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主动加以科学防范,才能够从问题出现早期的甄别到后期的处理做到尽早行动。所以坚持底线思维、提高监管能力始终贯穿在金融治理的全过程。

(二)有效提升整体性金融监管技术

在国际局势多变和国门越开越大的环境下,金融监管的方式方法面临新局面,需要打开新思路。一是金融监管要具有全局性和国际化视野。立足我国国情具体实践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效提升金融监管在权威塑造、专业能力、统一管理以及治理穿透上的实际效力,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金融系统的改革有六项之多,其中,成立于2018年的银保监会被撤销,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进入“一行一总局一会”时代^[13]。新架构下,更加强调从微观审慎上同时加强统一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解决分管真空地带和混业治理交叉等问题,形成金融监管全覆盖,在综合监管的基础上突显行为和功能监管。二是在监管中实现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的应用,以提升在数字化、信息化及智能化下的监管技术水平。进一步地,针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创新发展与金融跨境监管不相适应,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点“抓住人、钱、制度这三个监管关键环节”的理念,对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基础设施实行统筹监管,同时将金融活动全

部纳入金融监管的视野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7]152}。长远来看,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网络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跨界、跨区域与混业经营等特征有可能导致金融市场乱象丛生,但科技与创新融入金融服务也有可能给金融开放创造契机,这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未来应在助力金融要素更大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坚守风险底线,坚持创新与监管统筹协调发展,进一步延伸监管边界,避免治理真空。

(三)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9]310},这是消弭外部金融风险,控制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外溢,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实现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基本途径。从实际出发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一是改善金融运行外部环境,加强金融领域的国际治理合作。这与前文所述金融治理的国际化视野相呼应,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实际程度,应该是与国内金融发展的承载能力和总体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金融监管把控着这一动态平衡。过去的事实证明,跨境资本流动会催生更多的金融创新,一旦金融监管无法做到穿透式管理,金融市场等领域的顺周期性和跨市场交叉性问题会相应变得更加突出。其后果就是金融业、资本项目以及汇率这“三驾马车”不相协调而导致套利、套汇和资本“钻空子”等乱象。消除这些危害金融安全的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国际金融市场治理”,同时要“建设稳定、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联系,建立金融风险防火墙”^[14],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1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指向之一。二是主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增强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国近年来致力于深耕“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冲突的爆发可能会使多年努力受到影响,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未来还应继续利用好这些跨区域金融合作平台,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加快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标杆的自贸区建设,为打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通道,“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4]293}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5] 习近平.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N]. 人民日报,2017-07-18(01).
- [6]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EB/OL]. (2022-05-15) [2023-06-15].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5/15/c_1128649331.htm.
- [7] 习近平.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8] 习近平.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N]. 人民日报,2019-02-24(01).
- [9]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0] 习近平. 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N]. 人民日报,2013-10-08(02).
- [11]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3]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N]. 人民日报,2023-03-08(01).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38.
- [15] 习近平.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闭幕辞[N]. 人民日报,2016-09-06(01).

[责任编辑 李 新]

Correctly Recognizing the Major Principles of High-Level Financial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DENG Yumiao^{1,2}

(1.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Abstract: A high-level opening-up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key link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n open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proper meaning of expanding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new er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financial openness in an all-round and multi-level manner,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towards serv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to build a “domestic-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link and bridge through the flow and cooper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lements; to comply with the laws of the economy, and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rough financial openness to realize a greater scop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al economy; to strengthen risk awareness and improve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regulation system, and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Only by implementing and clarifying the major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can we, on the basis of safeguarding the core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sha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an open economy at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financial opening-up;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real economy;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